

湖北省黃陂縣革命史初稿

——抗日戰爭時期部分——

武大歷史系黨史調查隊

第一節 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工作(註)的開展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人民全面開始了抗日民族解放戰爭，但是，抗戰一開始，就出現了一條根本不同的路綫，一條是蔣介石集團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片面抗戰路綫，這是一條使中國亡國的路綫；另一條是中國共產黨代表的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羣眾利益的全面抗戰路綫，這是一條引導中國取得抗戰最後勝利的路綫。中國人民空前偉大而廣泛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就是在中國共產黨全面抗戰路綫引導下進行的。這兩條路綫的鬥爭，在黃陂亦有所反映。一方面，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青年知識分子，在亡國滅種的大禍逼在眼前情勢下，都迫切要求起來抗日，農村中的一些富農、地主、士紳為了保護他們本身的利益，也表示願意抗日；另一方面頑固的國民黨黃陂縣黨部和縣政府，在人民羣眾一致要求抗日的情况下，雖然也成立了所謂“黃陂抗日動員委員會”，但只是徒有虛名，並無實際的抗日行動，相反地，對於人民的抗日言行，却多方設法阻撓、破壞。鑑於國民黨政府不願真正抗日的態度，使人民羣眾深深感到要救中國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由於當時黃陂還未建立黨的組織，因此一部分愛國青年，如魏天一、劉天明、杜石夫等為了找尋抗日途徑，便從千里之外，奔赴全國抗日民主聖地——延安。而未離去的廣大羣眾和愛國青年，也迫不及待的希望能找到抗日救國的途徑和辦法。

一、中共黃陂特支委員會的建立和抗戰初期的抗日救亡運動

正值黃陂人民想抗日救亡但因缺乏領導和辦法感到苦悶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給黃陂人民帶來了希望，送來了辦法。1938年5月到延安學習的一些愛國青年，被派回黃陂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救亡運動。他們一方面在黃陂城內進行宣傳活動，並秘密建立和發展“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組織；另一方面以“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隊員為骨幹，組織了宣傳隊到澠口、祁家灣、橫店、長軒嶺、碾子崗等地進行巡迴宣傳，宣傳的主要方式是口頭演講，戲劇和標語，口號以及漫畫、傳單。通過這些形式來號召羣眾起來抗戰。經過他們宣傳、在羣眾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尤其是他們的演講和戲劇，更給羣眾留下了深刻難忘的印象；每當他們用沉痛的語句，悲憤的聲調，進行演講，或用戲劇宣傳中國人民面臨亡國滅種之大禍和東北同胞慘遭

註：關於黃陂縣抗戰初期的統一戰綫問題，從調查材料中來看，工作中存在着某些缺點，是否與當時長江局王明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領導有關，因資料缺乏，尚難肯定，目前只好將問題按調查材料反映出來，供同志們進一步研究。

亡国惨痛之现状时，羣众的脸上都显出悲痛和愤恨的表情，眼中流出泪水，有的竟泣不成声，如他们巡回宣传到祁家湾时，当时流亡在祁家湾的许多铁路工人看完他们演出的“放下你们的鞭子”和“最后一计”之后，很受感动许多人流出眼淚，有的竟泣不成声。铁路工人推举代表慰问宣传队，并送来了许多馒头，同时，再三恳切要求宣传队再演一夜。当宣传队员用豪迈的语句，宏亮的声调讲解平型关大捷时，羣众都兴奋起来呼喊，跳跃，伸出他们的拳头在空中飞舞。他们粘贴的标语口号、漫画传单，也很吸引羣众，受羣众欢迎。他们的宣传得到了羣众的同情与支持，在羣众中撒下了抗日的种子，羣众的抗日情绪被激发了起来，抗日救亡成了羣众议论的中心。寂静的黄陂已经沸腾，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代的革命精神又复行高涨起来。为了更好的领导和团结广大羣众，准备成立“乡村促进会”。国民党黄陂县党部与县政府见羣众起来了，异常害怕，就出来阻挠人民羣众的抗日救亡活动，故意推延批准成立乡村促进会；派党徒干扰羣众集会。但朔风已吹不冷羣众的抗战热情；威胁也吓不退他们的勇气。羣众性的抗日救亡活动并未停止，仍在继续进行。“乡村促进会”未被批准就另外组织了“暑期补习班”和“书报供应社”。通过补习班来团结、组织进步青年；用书报供应社来供应当时进步的书报、刊物，以满足羣众的抗日要求，帮助羣众了解全国抗战的形势。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人民羣众的抗日情绪也跟着不断提高，这样就更引起了黄陂县党部和县政府的畏惧和不满，他们进一步施用各种方法进行破坏：对“书报供应社”出售的书刊进行检查；要补习班申请备案；要到延安学习的魏天一等人彙报到延安学习的经过，并派人暗地监视他们的行动。然而在人民羣众同仇敌愾下，国民党黄陂县党部和县政府的阻挠和破坏，已阳挡不了人民羣众坚决抗日的行动，反而更激起了羣众的愤慨，在羣众的要求和支持下，魏天一等同黄陂县党部和县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提出了强硬的书面抗议。抗议书一方面斥责了黄陂县党部和县政府阻挠和破坏抗日的行为；另一方面指出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需发动羣众，使人民羣众与战争相结合，实行全民抗战，还指出要想发动羣众，必须实行民主，开放言论、集会等自由。同时将抗议书印发黄陂各介人士，深得广大羣众的支持与同情。魏天一等人这一行动给了黄陂县党部和县政府有力打击，迫使他们不得不佯装承认“你们的意见很好，我们准备逐步解决”。

通过宣传队的宣传和“暑期补习班”、“书报供应社”的活动，不仅鼓舞了人民羣众的抗日情绪，而且团结了一批爱国青年，为以后根据地的开闢和建设培养了一批骨干。

1938年7月，由于日寇的进攻愈来愈疯狂，国民党战场的节节败退，以黄陂县城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亦越发高涨和激烈，人民的抗日情绪更为激昂。形势提出了必须在黄陂建立党组织来领导抗日运动的要求。另一方面这时在爱国青年当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如魏天一、刘天明、祝季伟、杜石夫、陈慕点，因而也有了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同年8月，中共黄陂特支委员会（简称黄陂特支）在罗汉寺刘家畈刘天明家中正式成立。参加特支成立会的除了湖北省委派来领导成立特支的林翔外，还有祝季伟、刘天明、何其伟、陈慕点，（魏天一、杜石夫因路远未参加）会上林翔代表湖北省委宣布中共黄陂特支委员会正式成立，并指定祝季伟同志任特支书记。不久，湖北省委又派任仕舜回黄陂领导特支工作。

中共黄陂特支的建立，使黄陂抗日面貌为之一新。特支成立后，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领导了黄陂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除加强对黄陂县城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外，还决定在黄陂北部的梅店一带建立活动据点，一方面以此发动北部山区的羣众起来抗

日；另方面在梅店一帶先打好羣眾基礎，以備日後作為堅持抗戰的據點。特支派任仕舜同志回梅店一帶活動。任仕舜回梅店後，發起組織了“新梅店社”，提出“團結抗日，組織起來，共同抗戰”，通過壁畫、漫畫、標語和羣眾會等形式，廣泛宣傳抗戰，激發羣眾抗戰情緒，這樣團結了梅店一帶的愛國青年和抗日力量。當時參加“新梅店社”的有工人、農民、手工業工人、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

9月，形勢日趨緊張，日寇進入了大別山區，并向武漢、黃陂逼進，國民黨的潰軍沿漢（口）麻（城），漢（口）宣（化）公路敗退。鑑於這種形勢，湖北省委指示黃陂特支：不要把抗日工作停留在奔走呼號，遊行集會上，必須抓緊時機建立抗日武裝，以備日後堅持抗戰。中共黃陂特支研究這個指示後，決定把這個任務交給任仕舜同志，由任仕舜同志在梅店一帶發動羣眾建立武裝，因為，第一，梅店一帶有羣眾基礎；第二梅店一帶較靠近漢（口）宣（化）公路，容易得到國民黨潰軍的槍枝、彈藥；第三梅店一帶位於黃陂北部，又是山區，萬一黃陂縣城淪陷後，可退於北部梅店一帶堅持抗戰。任仕舜同志接受任務後，便發動了羣眾收買和拾取了國民黨潰軍的一些槍枝、彈藥，建立了一支四十餘人的抗日武裝，取名“梅店自衛隊”。“新梅店社”和“梅店自衛隊”的建立說明了中共黃陂特支對於建立根據地，建立武裝堅持抗戰的思想已開始明確了，但它們活動的範圍仍比較狹窄，發動羣眾仍不夠深入廣泛，武裝建立後也未抓緊一切有利時機迅速發展。

黨領導的黃陂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開展，一方面說明了與國民黨相反，我們黨是堅決主張抗日的，是愛國，愛人民的。同時也說明了只有在黨領導下，人民羣眾的抗日運動才有發展前途。另方面羣眾的抗日救亡運動說明了人民羣眾，尤其是工人、農民是抗日的堅決力量，而且也顯示了中國人民的抗日力量是巨大的。

由於黨從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領導，組織和推動了黃陂人民抗日救亡運動，因而給予了人民無限希望，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情緒。黨所提出的政治主張在羣眾中的政治影響也日益加深和增長。黨的威信提高了，許多羣眾都緊密地的團結在黨的周圍，這樣就為應付黃陂淪陷後的惡劣形勢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二、黃陂淪陷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

（一）黃陂的淪陷和淪陷後的局面：

抗戰爆發後，由於國民黨的片面抗戰路線和錯誤的戰略戰術的指導，使國民黨戰場節節敗退，大好河山淪入敵手。不到半年時間蔣介石就丟失了沿江沿海幾乎半個中國的錦繡河山，使廣大人民淪入奴隸處境，徐州失守後不久，日寇進入了大別山區國民黨潰軍沿漢（口）麻（城），漢（口）宣（化）公路向武漢，花園，廣水敗退，沿途打家劫舍，胡作非為；丟盔棄甲，狼狽不堪，槍枝彈藥俯首可拾。土匪流氓乘機而起，組織武裝，大則幾百數十，小則三五十人，其中主要的幾支勢力有蔡店、梅店一帶的李漢鵬，長嶺一帶的金龍彰，袁傑，程鵬；長軒嶺的江鉄狗，袁少其；羅漢寺、李家集一帶的尹昌彥。這些土匪武裝橫行鄉里，殘害人民。這時武漢已朝不保夕，鄰近武漢的黃陂也是風雨飄搖，人心惶惶。

1938年10月20日，敵人轟炸黃陂縣城，一個將近三萬居民的繁榮城市，被炸得幾成廢墟，死傷居民達五百餘人，日寇這種滔天罪行，給黃陂人民打下了子孫難忘的烙印。凡有點民族氣節之人，對日寇無不咬牙切齒，刻骨仇恨。

大轟炸的硝烟未散，死难的同胞血跡未干，吃人的野兽——日寇在10月24日以坦克一輛，孤軍深入，沿公路敗退的国民党軍隊竟不敢抵抗，紛紛丢枪逃走。敌人在黃陂县城外魯台到流矢湖沿公路两旁用机枪瘋狂扫射，我軍民死伤无数，慘不忍睹。日寇侵占黃陂后，燒杀、淫擄更令人髮指。日寇的兽行并没有鎮压黃陂人民抗日情緒，反而更加点着了反抗的烈火，反抗的呼声傳遍黃陂，民气的沸騰达到高潮。

無論是工人，农民或者是一般地主士紳都深深感到除坚决抗战是別无出路，这样就进一步促进了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工作的开展。

（二）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工作的开展。

由于中国人民面临的是異常强大，兇狠的日本帝国主义，因而注定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必須經歷一个长期的，持久的，极其复杂和曲折的过程。中国要想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国共产党就必须动員一切可能动員的抗日力量，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同盟者，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以孤立敌人壮大自己，如果放棄了應該團結和可能團結的力量，就会使自己陷于孤立，壮大敌人的同盟者，这样就会导致抗日战争的失敗。同时由于日寇的瘋狂侵略，改变了国内的階級关系，使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建立有了可能。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領導人民对蔣介石集团的压力，另方面蔣介石集团为了維護四大家族的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因此才答应与中国共产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

中共黃陂特支建立前，虽成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做了許多工作，但由于国民党黃陂县党部和县政府的上层統治人物，如县党部書記长刘法等的态度頑固，故未能很好奏效。

中共黃陂特支建立后，繼續坚持貫徹抗日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当时爭取的主要对象是以潘正道为代表的开明士紳和有抗日要求的中小地主。潘正道是到任不久（1938年9月到任）的国民党黃陂县县长，思想比較进步，同时在他上任时，黃陂抗日救亡运动正向高潮发展，在人民羣众一致抗日的要求下，在董必武同志和中共黃陂特支的影响和幫助下，潘正道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民主，自由。黃陂特支的領導人和一些黨員也都参加了潘正道政府的“抗日动員委员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領導和推动抗日工作。

黃陂淪陷时，潘正道政府轉移到黃陂北部的蔡店、梅店。我党的負責同志及其它黨員亦隨之北迁。到蔡、梅店后，我党旋即在梅店素山寺办了一个“抗日青年訓練班”，参加訓練班的除了蔡店梅店附近的爱国青年外，另部分是黃陂县城淪陷后，北上到蔡店、梅店的青年，訓練班的學員共有百余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統一战綫，游击战朮和社会科学引論。通过訓練班培养了一批骨干，訓練班中的很多學員，都成为以后抗日民族政府中的干部。与此同时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梅店自卫队，由于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也得到了一些发展。

潘正道政府与我党合作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民主、自由，但仍然害怕轟轟烈烈的羣众运动，他們不敢充分发动羣众，更不敢放手建立羣众的抗日武装。对于李汉鵬的土匪武装又缺乏警惕，在1938年11月26日（阴历10月26日）晚上，潘正道政府遭李汉鵬匪軍偷襲，其政府被摧毀，軍隊潰散。事变之时，我党幸獲事变消息，急将“抗日青年訓練班”和“梅店自卫队”撤走，故未遭損失。

事变后，党組織决定由任仕舜領導梅店自卫队和部分“抗日青年訓練班”的學員向經扶

轉移，同时又派刘天明，祝季偉到經扶与郑位三同志联系。

1939年春，国民党鄂东行署派胡俊蓀来黃陂任县长。胡俊蓀在黃陂长堰仙台寺建立了县政府。党为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便通过民主人士柳野青，王焱宗的关系与胡俊蓀取得了联系。胡俊蓀想利用我党为他做些工作，以便抬高他的威信，扩张其势力，故答应与我党合作。在我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又恢复了“抗日动员委员会”，开办了“抗日宣传训练班”。同时组织了一个宣传队，经常深入敌后农村，向广大群众宣传抗战。在胡俊蓀的游击支队中，党组织也进行了经常性的宣传工作。所以在这段时期中，无论是群众，或胡俊蓀的游击支队的抗日情绪都有所高涨，抗日意志也增强了。有一次日寇进攻塔尔岗，在军民团结下击退了日寇，鼓舞了人心，我党的威信和影响也增长了。因而又引起了顽固分子刘法等忌恨，他向鄂东行署专员程汝怀处密告胡俊蓀政府内有“异党”活动。这时正值蒋介石集团为了扫除投降障碍在全国加紧了反共反人民的活动，通过了许多反共反人民的决议，如处理异党实施办法等；并且向抗日根据地举行军事进攻，在陕北包围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命令八路军退到滄石路和正太路以北，并集中大军以中条山为基地，由南而北，向我进攻。……程汝怀也根据蒋介石的密令，在湖北地区围攻新四军的后方机关，对黃陂的“异党”活动也派人进行调查，并密令胡俊蓀制止我党的活动。但由于我党的斗争使程汝怀等阴谋未能得逞。

通过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了一批开明士绅，中小地主等上层人士，这样不仅壮大了抗日力量，孤立了敌人，而且为贯彻我党的政治主张，推动抗日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些收获证明了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但是中共黃陂特支在抗战工作中亦存在着缺点；工作多在上层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没有很好地深入广泛的发动群众。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到，从1938年8月中共黃陂特支成立后，就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领导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黃陂特支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使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巨大的成绩，因而为以后开辟根据地，建设根据地作了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但是，中共黃陂特支，正如前述在统战工作中也存在缺点，同时在武装问题上，虽建立了一支抗日武装——梅店自卫队，但人数不多而且未抓紧一切有利时机使它发展，扩大。虽然存在这些缺点但中共黃陂特支在统战等工作中仍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正因为黃陂有了党的领导 and 扩大了人民群众对党极高的信任和拥护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我党领导的抗日救国教育下所蕴含的高度仇敌抗日情绪，都是无穷无尽的力量，这些力量也是黃陂抗日根据地能够开辟、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因素。

第二节 根据地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

一、新四军进入黃陂及对敌伪斗争的胜利

黃陂根据地的开辟开始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这时期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行动为辅的方针，而把军事重心转向了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汪精卫投降了日寇，国民党也执行着积极反共的方针。

黃陂淪陷后基本上控制在日、伪、顽三种势力手上，日军占据了全县的交通要道，并设防把守，但因日寇兵力少，不能把势力伸入黃陂的每个角落，这样为我们留下了广大的后

方，使建立抗日根据地有可能，可是这广大的后方却被伪军和积极反共的顽军占去了。1939年投降日寇的国民党军二十五师赵光荣，熊慕辉部占据了黄陂西北部，伪军李汉鹏占据了北部山区，大别山上则聚集了数万国民党的溃军，他们执行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妨碍着抗日根据地的开闢。

当敌人的方针刚开始转变时，我新四军对敌伪展开了进攻。1939年5月13日新四军五、六大队和梅店自卫队在张体学、罗厚福、任仕舜的率领下，共四百余人进入黄陂县境。南北夹击李汉鹏伪军。李伪军原为地方顽固派所把持的一股地方势力，开始时还悬挂青天白日旗，不久便换上了“太阳膏药”旗，李部是伪军中最大的一股，约万余人，它是在短时期内聚集起来的一羣乌合之众，各部之间也矛盾重重。在新四军英勇奋战下全歼李本部，缴获重机枪九挺，步枪几千枝，及其它大批的军用物品。其余各部则纷纷逃窜或向我军投诚。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乘胜追歼逃出黄陂的李伪军残部——刘梅歧等，新四军便在全歼李本部后旋即退出了黄陂。新四军歼灭李汉鹏伪军的巨大胜利，对黄陂根据地的开闢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这次战役中，我们缴获了伪军大批武器，武装了自己。它起了彼荆刺的作用，为黄陂根据地的开闢，扫除了一个重大的障碍。从敌伪手中夺回了广大的后方，使顽固派地主失去了依托，为以后广泛的统战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再者，我军的胜利提高了我党在羣众中的威信，增强了羣众抗战必胜的信心。

8月，日寇乘虚而入，从城關大举进攻胡俊蓀政府所在地——仙台寺。因胡政府及其军队没有很好提防，结果政府、军队全部溃散。日寇在进攻仙台寺的同时，制造了继黄陂轟炸后的另一次惨案——王家河惨案。当天正逢王家河赶集，日寇突然包围王家河，把集上的人羣赶到附近的田里，残暴的日寇挥舞着大刀向若五百左右手无寸铁的无辜的中国人的头上砍去，兇恶的日寇并以此取乐。五百多个中国人的鲜血淹没了面积若一担的水田，五百多人的屍首堆成山崗。直至现在黄陂人民叙述此事时，都无不切齿痛恨。

日军进攻仙台寺时，鄂东行署专员程汝怀却配合日军的行动，带兵进入黄陂，利用日寇兵力少不可能占据广大山区的弱点和趁我军还在追歼伪军之机会，占据了我军开拓出来的广大后方，并设立了顽固的国民党县政府。

王家河的大血案，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态度，深深教育了黄陂人民：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保护人民利益，代表人民愿望的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武装。靠国民党军队想取得抗日胜利是决不可能的。

二、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及其被迫西迁

由于战争的残酷性，长期性，游击战争不能没有后方，不能没有根据地。根据地“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个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實現就失掉了依托”，它也是实行持久战，争取变敌我力量对比，组织反攻和取得最后胜利的基石。

胡俊蓀政府垮台后，党仍然积极为根据地的开闢，民主政权的建立坚持着斗争，新四军五、六大队临走对留下了一部分武装，在这个基础上，在党的领导下，由黄宏儒等组织了八大队，与此同时，党内成立了陂孝北县委员会。这时期的斗争是复杂而曲折，在复杂，曲折的斗争中，尽管有时党受到一些挫折，但始终是在不断发展、壮大。1939年9月初，国民党顽军徐

少階部在李家中詐降我們，我們因沒有很好提防，結果上當，俘去了我們十多人。不久，陂孝北縣委會就無形中散了。黨根據新的形勢作出了新的布署。一部分人去鐵路西，一部分人參加了新四軍。黃陂地方黨組織的活動中心也轉移到了敵占區的城關附近，只有魏天一、劉天明、陳慕點帶領一小股武裝仍然活動在北部山區。這時黨的活動特點是較前分散，但較前深入了，虽有敵人封鎖綫，頑軍的警戒區，給黨的活動添了不少困難。由于黨工作的加強，杜天仇、彭何能等同志甚至打入了敵偽的組織內部，隨後黨的武裝也有了發展。1940年在趙家棚成立了路東挺進團，同時成立了陂安南縣委會，由楊業真任縣委書記，黃宏儒任付書記。到這時鬥爭仍然是複雜的。不久楊業真同志帶的路東挺進團的一部分在黃安縣齊店附近叛變，楊業真同志犧牲了。黃宏儒所率的路東挺進團的另一部分則轉到黃安，這樣陂安南縣委會又解散了，但魏天一、祝季偉等人仍留在黃陂堅持活動，並恢復了特支，領導鬥爭。在這複雜的鬥爭中，黃陂黨組織堅持過來了，力量雖然不大，但對後來黃陂根據地民主政體的建立起了一定的作用。因為在複雜的鬥爭中壯大了地方武裝，鍛煉了廣大幹部，更多的人學會了武裝鬥爭，這是根據地民主政體建立不可缺少的條件。

1940年新四軍五、六大隊分別回到了黃岡和札山，3月初陳少敏同志則帶領老一、二、三團的一部分軍隊，從安陸應城過路東，來到了黃陂境內的双河、汪河一帶，旋即在蔡店召開了一次規模較大的代表會議，當時參加的人很多，地區也很廣泛，連淪陷區也派了代表參加，這次大會主要是籌劃抗日根據地民主政體的建立和討論擴大統一戰綫的問題。邊區領導幹部劉西堯、吳祖詒一到蔡店就活動開了，組織蔡店一帶的青年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並組織了一個工作隊。在這個基礎上4月上旬，黃陂黨組織便以“憲政促進會”的名義召開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選舉了以黃署晴為首的抗日民主政府（黃署晴是國民黨人，但他與當時的田江昌“游擊政府”及蔣少元有矛盾，而且又是贊成我們縣政促進會的）。

這個政權是按三三制建立起來的，因為頑軍的進攻，它僅存在了兩個月，但在黨的正確領導下，就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做了不少的事情，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一方面廣泛地進行了民族統一戰綫的工作，號召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到五月連黃陂有名的士紳如趙南山、陳仇九等也被爭取過來了；另一方面，組織幹部下鄉宣傳，開展民主化運動，建立基層政權，在相當大的範圍內建立了農民救國會，青年救國會等羣眾性組織。這時政令所達範圍，也逐漸由蔡店、梅店（陂五區）一帶推廣到了柿子樹店，塔爾崗，同興集一帶，陂四區亦正在開闢中。

在發動羣眾建立基層政權的同時，開始了黨的基層組織的建設。1940年4月以前，黃陂黨組織主要是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中發展黨員。政權產生後，首先在蔡店等地建立了黨的支部，發展了一些新黨員，也恢復了土地革命失敗後，因環境惡劣與黨失去聯繫的部分同志的黨籍。黨的建設工作從這時起，轉入了農村，隨着基層組織的建立，無疑的將大大的壯大我們黨的隊伍，和改變黨的成份，也將加強黨與廣大農民羣眾的聯繫。這時一切工作都蓬勃的向前發展着。

5月間，程汝懷趁新四軍已由陂安南開赴長江沿岸前綫作戰和根據地民主政體還在初創的時候，命令其部下蔣少元、李九皋進攻我抗日民主政府。5月30日我政府被迫西遷，正在籌建長堰區的任仕祥同志，光榮犧牲在蔣少元的屠刀下。一部分黨員又轉移到了縣城附近，恢復了原來的特支。它和留下來的小數武裝繼續堅持着敵後的鬥爭。

三、对頑固派斗争的胜利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重建

抗日民主政府被迫西迁后，国民党鄂东行署派来了頑固政府，他們与近在咫尺的日軍相安无事，对人民則进行着残酷的压迫剝削、敲榨和勒索；要錢要米，要壯丁，常以要丁为名行打家劫舍之实。日寇在王家河的屠杀、頑軍的四处搶劫，与抗日民主政府、新四軍的爱护人民、英勇抗敌形成了一个鮮明对照，人民再也不能忍耐了。蔡店一带的羣众紛紛起来，有的組織或参加紅学、有的組織其它团体，总之在以各种形式組織力量，武装自己。1940年冬天，頑軍五六十人以收稅为名，在蔡店附近搶劫行商的布匹十几担，蔡店紅学見了，便鳴鑼聚众，附近的紅学聞声响应、揭竿而起，打得頑軍惶惶逃窜。这里反映了人民要求組織起来抗日，也說明了人民是痛恨积极反共，欺压人民的頑軍的。

不久国民党又在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后新四軍編为七个师。新五师在李先念同志率領下来到了大悟山，开始了大悟山根据地的开闢。1941年1月，新五师鄂东軍区师令罗厚福帶領新四軍部分队伍，再度进入黃陂，一夜工夫消灭了黃陂境內的伪軍。并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把黃陂境內的頑軍也通通赶到大別山李品仙之老窠去了。

1941年3月，黃陂抗日民主政府又重新建立了起来。魏天一同志担任县长，任仕舜同志任县委書記。从此黃陂广大地区便由游击区、不稳定的根据地成了大悟山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

在抗日民主政府中，共产党、左派和中派各占三分之一，它是按照党中央所指示的“三三制”組織起来的，它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战綫的，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階級联合起来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政府的权力机关是各介人民代表會議。代表性很广泛，包括了进步人士，中間派，甚至連黃陂有名的“四大金剛”——趙南山、陈仇九、胡康民、柳隶園也在其內。代表會議討論和作出貫徹党的各項政策的決議。

黃陂党組織对民族統一战綫的工作是非常重視的，政权建立后，统战工作做得更有成績。通过统战我們团結了开明士紳，地主、知識分子等中上层人士，并通过他們进行了对敌斗争，甚至于打入了敌伪組織的内部。同时通过他們使上层人士消除了对民主政府的疑惧，扩大了民主政府的影响。对爭取敌占区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同我們一道抗日，以及宣傳和貫徹党的政策均起过良好的作用。

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民主政府，从成立时起，就开始了锄奸活动，以巩固我民主政权。此外，还进行了如下一系列的巩固我政权的活動。

(1)基层政权的建設：为了统战和适应战时的环境，我們沿用了战前的区划，先后成立了陂二区（长鬃）陂三区（塔尔崗），陂四区（炮桐、李家集）陂五区（蔡店、梅店）陂六区（六指店、桃園）。区以下的乡保甲組織也沒有变动，連原有的区、乡、保甲成員及名称基本上也未变动，只是将联保主任改为了乡长。

1941年下半年，召开了各級人民代表會議，會議选举了各級政权机构，大批的积极分子选入了政府部門，强化了抗日政权。县代表會議还定出了“施政綱領”，規定了減租、減息等民主政策。随着政权的建設，党組織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党的組織机构系統化了，县設

縣委會，區設區委會，區以下則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成立總支或支部，支部下分設小組。顯然黨組織不但人數上增多了，黨的組織系統也更加完善了。

(2) 建立地方武裝和改造紅學：地方武裝的建立，在政權成立時就開始了。縣區都設立了武裝。縣設大隊，轄四個連，約三百二十餘人。區設中隊，每中隊二十人到五十人不等。民兵組織也按行政系統，在各級行政組織和農救會等羣眾組織的推動下，在各基本區，游擊區建立起來了。地方武裝和民兵組織的建立不但加強了我抗日武裝力量，也鞏固了我抗日政權，成為了我抗日政府的一個重要支柱。地方武裝和民兵組織的建立，這是武裝建設的基本的一面。武裝建設的另一方面就是對紅學的改造。紅學是一個傳統的封建迷信的羣眾性組織。在根據地開闢前，紅學常為大地主所掌握，為日偽所利用，但它們仍然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他們中間有的是抗日的，也有的對頑軍採取了自衛。我黨一開始就對紅學採取了正確的團結抗日的方針：打擊其最壞的投靠了日軍的分子，爭取那些可以爭取的分子，教育和幫助他們脫去落后的外衣，保存和發揚它們保鄉防匪打擊敵偽的進步一面。1941年開始了改造紅學的工作，號召他們武裝自己，並幫助他們成立自衛隊。一年之後，隨著羣眾覺悟的提高，對紅學又進行了一次整頓，清洗了流氓和異己分子，蔡店，柿子樹店的紅學最後改造成為民兵組織。

(3) 發展羣眾組織：為了發動廣大的人民羣眾，特別是農民有組織的參加抗日和根據地建設，政權建立後便着手成立了農民救國會，青年救國會，婦女救國會等羣眾性組織。它們團結了廣大農民、青年、婦女在黨的周圍，它們把廣大的羣眾，特別是農民組織了起來，成為了民主政權的基石，抗日的基本力量。為了吸收游擊區、淪陷區的知識青年和各界羣眾有組織的參加抗日，還成立了“青年聯誼社”和“抗日十人團”（簡稱抗十團）。

“青年聯誼社”成立於1941年6月，主要是吸收游擊區、淪陷區的知識青年到根據地來學習和工作。

同年冬天成立“抗十團”。這個組織一般設在靠近淪陷區的地方（如陂四區、陂二區），參加的人極為廣泛，其中也包括有漢流、紅學、鹽保長等。我們通過“抗十團”的成員向淪陷區的人民作些宣傳工作，增強羣眾抗日的信心，也通過它獲得了敵偽的一些情報和控制了一部分日偽的維持會。這個組織在對敵偽的鬥爭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因缺乏黨的直接領導僅存在了半年。

從1939年到1941年，黃陂根據地和抗日民主政權終於建立起來了。雖然經過了一段艱難曲折的過程。

黃陂根據地的開闢，它壯大了大悟山根據地，變敵人守衛武漢的屏障為我軍直取武漢的要地，變敵人之據點為我守衛大悟山根據地的前哨。是伸向武漢的一把尖刀。

根據地和民主政權建立後，在各項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總的說來，還只是開了個頭，搭起了一個架子。廣大的羣眾還未深入，廣泛的發動起來，農救會等羣眾性組織也尚未普遍的建立，它們的作用亦沒有很好的發揮，減租、減息也只是停留於一般的號召和試行。

敵人的殘酷掃蕩和經濟封鎖使剛剛開闢出來的根據地又處於了困境之中，接着便開始了根據地艱苦堅持的階段。（未完待續）